

香港服务业深度参与大湾区发展研究

□ 左晓安,孟令宇,梁宇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00)

摘要:香港服务业融入大湾区发展是必由之路。为支持香港服务业在以广东省为重点的内地找到发展新空间,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搭建了多个平台,特区政府也出台了香港服务业北上融合发展规划。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引导带动了香港服务业在广东和大湾区的布局和发展。但也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粤港体制机制运行差异、缺乏对新型服务业的有效指导与市场监管、专业服务业利益协调不足、经济要素在大湾区内部自由流动不足等。粤港各界需要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作为大湾区建设合作旗舰;加大力度鼓励大湾区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强监管合作,创新监管模式;推进数字赋能服务业工程,加快粤港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举措;成效;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14(2022)012-0007-05

Research on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s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ZUO Xiao-an, MENG Ling-yu, LIANG Yu-hong

(GDASS Research Center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510600,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northwar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is the only way. In order to support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to find new spac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mainland, with Guangdong Province as the focus, China has successively issued a number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Market forces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have driven the layout and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serv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However, it also faces some unavoidable constraints: Differences in the operation of system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Lack of effective guidance and market supervision for the new service industry; Lack of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sufficient free flow of economic factors in Greater Bay Area, etc. All circles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need to build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into the flagship of Greater Bay Area cooperation; Strengthen efforts to encourage Greater Bay Area to develop new forms and models of service industry; Strengthen supervisio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e supervision mode; Promote the project of digital enabling service industry and accelerate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Keywords: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ervice Industry; Measures; Effect; Constraints

一、香港服务业深度参与大湾区发展是必由之路

1. 香港服务业需要拓展新空间

二战结束以后,香港还是相对落后的经济形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完成工业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香港的制造业陆续向广东等内地转移,除了本土原有的服务业之外,与转移到内地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开始在香港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增加值到二十一世纪初实现翻倍增长,占GDP比重达到90%以上(图1所示)。如今,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金融、贸易、航运与物流中心,专业服务业比肩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产业国际竞

争力名列前茅。纵观香港经济产业发展脉络,香港的成功,离不开对国际产业转移机会的把握,离不开对国际资源的利用,离不开在国际市场上的大进大出,也离不开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香港是小型城市经济体,经济发展对外依赖度非常高。实际上,以服务业为核心的香港经济近年来已经呈现出增长乏力的态势。香港特区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向科创转型,加速融入内地发展,在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承担中实现经济社会的二次飞跃。科创的发展、“超级联系人”角色的承担,离不开与内地经济产业的融合发展,其服务业破茧重生的出路在内地,在大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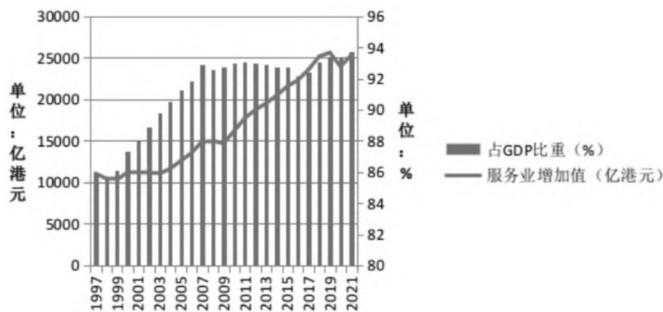


图1 1997—2021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年刊》各年

2. 广东发展新阶段对服务业的需求为香港提供了难得契机

改革开放后,广东以低生产要素价格比较优势为契机,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中实现了经济和制造业的腾飞,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但随着经济发展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广东经济产业发展需要转型升级,依赖新的比较优势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广东经济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广东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需要生产性服务业注入新的附加值,广东制造业的国际化发展也需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发、营销、商务发展服务行业为其保驾护航,这一切都指向广东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广东开始着力推动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40%以上提高到2021年的52.8%,增加值增长10倍以上(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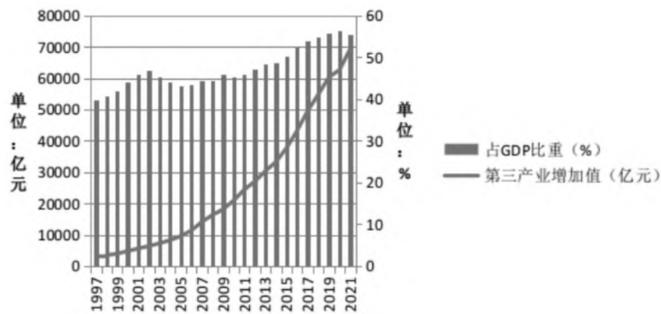


图2 1997—2021年广东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各年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广东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步入次高速增长阶段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迎来发展期,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互联网、跨境电商发展,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快,原本依靠成本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结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增,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GDP中的比重也将快速提升。这意味着对服务业的需求,特别是对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将随之增加^[1]。广东服务业发展虽然步入快车道,但发展水平和规模仍然和广东发展新阶段的需求不相适应,与广东经济结构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巨大需求缺口

不相适应,巨大的需求缺口为香港竞争力全球领先的服务业进入广东、服务大湾区建设提供了难得契机。

3. 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需要香港服务业北上大湾区实现产业共赢

在数字化、智能化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助力下,制造业与服务行业日益呈现融合发展的趋势。制造业与服务行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一方面,在制造业的制造链环节分工越来越细,前端的融资、研发、设计,后端的销售、推广、展览在制造业公司中成为独立的部门,呈现服务化特征;另一方面,制造环节对专业服务的依赖越来越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呈现这一特征。以制造业附加值考量,制造业产品附加值里面,单纯制造环节比例不断变少,设计研发、物流、金融、营销维护等服务性环节比重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了整体服务业50%的比重,占GDP的比重还在不断上升。服务业向制造业不断渗透强化,服务业产业链朝制造业不断发展^[2]。香港制造业基本已经转移到以大湾区广东区域为重点的内陆,服务业一枝独秀的产业结构要想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增加附加值,其出路在于北向发展,与广东制造业强强联手,适应国际产业发展趋势,融合双方资源优势与竞争优势,才能达到倍数提升竞争力的目的。

4. 消费升级背景下粤港需合力创新服务业供给模式

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已经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产品、消费模式、消费业态等服务业发展跟不上时代发展需要就是其痛点之一。我国正处在消费升级的重要关口,传统的吃、穿、用等物质型消费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互联网模式下的娱乐、游戏、竞技消费,新经济发展态势下的新培训、新体验、互动新模式、信息消费,经济能力提升和医疗技术突破带来的医养消费、形体保健、美容服务等等,各种能力提升型、生活质量提升型、新经济适应型服务消费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从消费模式看,个性体验式消费正超越大众化消费成为消费主流;从消费需求来看,对服务型产品的消费需求正快速赶上甚至超越对物质型产品的消费需求;从消费活动地域特征来看,跨境跨国消费快速发展。消费需求、消费模式、消费地域的变化为新型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行业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带来发展的新动力,迫切需要行业进行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服务创新^[3]。我国整体上的消费升级和粤港澳大湾区消费升级的产业发展趋势既为粤港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挑战,也为其拓展新空间、创新新业态新模式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香港消费性服务业的多样性、高品质、国际性是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脱变更新的优势,广东区域近年涌现的新消费、新技术、新模式也未尝不是香港服务业所需要的。两者的融合、碰撞、重组,才能培育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服务行业。

5. 新技术带来的集聚效应亟待香港服务业深度融入大湾区抢占新机遇

新技术正在加速服务业和服务型企业集聚性、专业化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技术领先的头部服务业企业通过网络互连迅速拓展市场,而其经营布局却没有必要在全国各地扩散,其主要的运营机构、研发部门和公司供应链向少数配套能力强的核心区域集聚。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技术集中、人才集中、供应链集中、市场消费能力的相对集中的发展趋势加速了服务业向大城市、中心城市、城市群集聚。例如,在杭州起家的阿里巴巴与在深圳起家的腾讯这两大服务业巨头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机遇,不仅把自己发展成为信息、商务服务提供商巨头,而且利用本身规模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将专业技术、营销服务业提供商聚焦到自己身边,加速了高端服务要素的集中,不断向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化生活等新技术和新产业拓展,在各自城市建立起相应新兴服务业发展生态和集群^[4]。目前,就大湾区服务业发展业态布局来看,横琴,澳门正形成国际休闲旅游产业集聚区,深圳正形成信息服务产业集聚区,广州正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各个集聚区各具优势和特点,香港的相关企业和行业只有参与进来,才能在共同创业中分享产业集聚红利。

6. 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国际潮流需要大湾区产业界共筑服务业国际竞争新高地

当今国际经济舞台逆全球化有所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服务业开放发展的潮流却仍在不断向前。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衡量,近年来全球服务业开放水平稳步提高,多数行业开放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在服务业22个行业中,2015—2020年全球有12个行业的开放水平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服务业开放扩大的主要力量^[5]。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出来。大湾区服务业如何在开放的大潮中确保供应链稳定尤其是核心生产性服务业供应链稳定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者作为中国产业转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领头羊,需要在推进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大规模对外开放之前,优势互补,优化资源,做大市场,构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稳定供应链,将大湾区服务业做大做强,筑牢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的根基,探索开放发展的经验和规则。

二、粤港服务业合作的举措和成效

1. 国家和广东省全力支持

①为支持香港服务业在以广东省为重点的内地找到发展新空间,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是其标志。2003年6月9日,商务部和特区政府财政司签署该协议。此后,中央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又于2004年至2013年连续签署了十个《CEPA补充协议》,2015年签署《CEPA服务贸易协议》,2017年签署《CEPA投资协议》和《CEPA经济技术合作协议》,2018年签署《CEPA货物贸易协议》,2019年,签署《CEPA服务贸易协议》。CEPA协议和后续

补充协议在多领域大幅提升了内地服务贸易对香港的开放水平,进一步降低了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在多个重要服务领域都增添了开放措施,让香港服务提供者可以更容易在内地设立企业和发展业务,更多香港专业人士可在内地取得执业资格,更多优质的香港服务可提供给内地市场。

2009年,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支持粤港深化服务业合作。

2010年4月7日,粤港两地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粤港双方在教育、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应用工业设计、旅游、软件设计承包服务等方面的分工和互补,而在金融方面则以香港为龙头,带动广东省的现代服务业。广东在年度《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工作中,每年都会出台若干促进粤港服务业合作的措施。

2019年2月18日,国家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出要加快粤港服务业合作的分工和互补发展,主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加强金融合作。循序渐进扩大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深度与广度,容许香港金融机构为大湾区广东区域提供理财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支持香港金融机构在广东前海、南沙、横琴等三个自由贸易区开设附属机构开展相关金融服务业务。第二,支持香港保险机构扩大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区域开展创新型车保、跨境医保等保险业务,提供保险产业链服务。第三,加强粤港物流行业合作。整合资源,促进优势互补,扩大第三方物流、冷链物流服务能力,提升大湾区物流管理水平,提出要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物流枢纽。第四,合作扩大大湾区专业服务业合作范围,提升专业服务业发展水平。在工业设计服务、文化创意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等领域扩大对港开放,支持粤港合资、合作建立专业服务业营业机构。第五,加强影视产业合作。充分利用香港国际交流渠道网络、影视人才资源,提升双方投资领域合作,促进影视人才交流^[6]。

②搭建促进粤港合作的平台。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定位前海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2011年3月,国家正式将深圳前海开发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前海,期许前海要加强粤港合作,要依托香港的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要充分发扬特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落实比特区还要特的先行先试政策。

2014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横琴新区三大片区,支持广东自贸区试验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对香港会计、税务、建筑、金融、律师等专业服务机构的设立或执业给予特殊安排。进一步推进扩大对香港服务业的开放,推动粤港两地企业拼船出海,携手开拓国际市场。

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扩大前海

合作区发展空间,将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里。明确打造前海合作区为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粤港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合作的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广东省规划,前海合作区“扩区”后,1/3 的新出让产业用地面向港资港企,以支持香港经济拓展发展空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为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扩大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业对外开放,正加紧制定《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规划和政策措施。2021 年 12 月 15 日,广东省司法厅印发《关于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管理试行办法》,推动港澳律师服务在大湾区加快落地。

2. 特区政府出台香港服务业北上融合发展规划

关于香港服务业要不要加快北上的问题,香港社会曾经存在不少争议,有些声音担心会像香港制造业北上一样,掏空、削弱香港的服务业基础,香港特区政府在推进北上的措施方面也曾经表现得并不是大刀阔斧的风格。政府层面的推广活动香港贸发局做得相对多一些,例如在珠三角多次举办大型香港服务业推广活动。但 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平息后,中央重典治港,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改革香港选举制度使香港由乱转治,特区政府施政掣肘明显降低,加快了对香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规划的出台。2021 年 10 月 6 日,林郑月娥特首发布任期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在新界北构建占地 300 平方公里的“北部都会区”,以深港两地和大湾区优势互补为宏大视野,全力加强深港跨境口岸和交通基建,全面深化深港两地在科技制造与服务、金融服务、文旅休闲等行业对接发展,这些举措必将成为推动大湾区服务业合作向纵深发展的主要抓手和重要助推器。

3. 成效

近年来,大湾区已经成为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承接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省的 90% 以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 75.8% 来自亚洲地区,其中香港一地就占到了 63.2%^[7]。香港服务业者在大湾区注册经营各类规模的服务业企业已经达到数万家。内地首家港资银行异地支行、首家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首家港资独资建筑设计事务所等一大批服务业项目在广东落地生根。国家推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主要面向港澳的合作平台后,这些平台成为吸引香港服务业投资的新亮点。2021 年,前海合作区港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 156%,港资占前海利用外资的 93.8%,在前海注册经营的企业已经达到 1 万家以上。在粤香港服务业企业已经具有显著的地域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从细分行业上看主要集中分布在生活中服务(27.82%)、房地产服务(9.66%)、企业服务(29.54%)、生产性服务(22.66%)、金融服务(4.21%)、专业服务(3.44%)、政府及公共机构(2.1%)和综合服务

(0.57%)领域^[8]。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接近 60%,已经对相关制造业形成了强力支撑。

服务领域向教育和医疗等传统公益色彩较重的领域拓展。香港高校掀起大湾区办分校的热潮,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分校、香港理工大学佛山分校、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UI(珠海)等,借助双方比较优势,推动人才培养研发服务,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地中小学名校合作也已经在大湾区起步,如华师附中教育集团与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K16+教育创新联盟。医疗卫生合作加速发展,如香港大学参与运营管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数家港式医疗机构成功地在内地投资运营医院和诊所;医疗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三、香港服务业深度参与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三地在专业人才、产业基础、法制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各有比较优势。近年来,三地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深化合作,已经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此基础上,三地的合作空间广阔,合作前景值得期待。但也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 三地体制机制运行差异

目前,粤港澳三地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个客观状态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在这种模式之下,广东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地区则沿袭实行的是类似西方的制度,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体制机制的不同,一方面,能够使香港扮演沟通中西方合作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另一方面,也会对合作产生阻滞效应。主要表现在法律制度、法治环境培育体系、企业合作法律文本不同,影响企业合作效率;广东对经济社会发展实行的是积极干预政策,但香港特区政府回归后沿袭惯常做法,推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粤港澳联席会议、CEPA、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执行能力受到削弱。

2. 对新型服务业缺乏有效的市场指引与监管合作

现代服务业与数字经济、VR、AR 等技术的结合,衍生了许多服务类型和服务模式,并且这些新的服务领域和服务模式还都在不断延伸和变化中。新产业技术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是未来服务业的制高点,是广东产业竞争力发展的源泉和服务业发展的希望。一方面,对它们的发展要有容错的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和政府相应的政策配套。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缺位也不利于这些行业的健康、互利发展。就目前来看,广东现代服务业产业格局存在严重的粗放型问题,导致企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上浮,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市场缺乏对新型服务业的有效指导与监管,由市场自我调节发挥主要作用,使得整个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处于波动状态,不利于初创型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发育和成长^[9]。香港的现代服务业来大湾区发展,与广东本地企业合作,除了面对这些问题之外,还存在两地市场

准入和退出、行业管理规则、行业认证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在合作中加以逐步解决的问题。

3. 专业服务业利益协调方面的因素

利益协调很多时候是阻碍各地开展产业合作的主要障碍,同样也是阻碍粤港服务业合作的障碍。两地利益协调在政府层面表现为粤港两地税收财政分配问题;在广东大湾区内部涉及到如何布局产业链内不同产业,实现产业发展的问题;在民意层面,也受到两地群众民意的左右。此外,粤港两地虽然经过多年的合作和交流,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两地还是自成封闭的系统,各有各的利益考虑,各有各的优先事项,对合作发展的阻碍作用还是明显存在的。

4. 发展要素自由流动不足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粤港两地在资金、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方面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就服务业行业要求而言,它对要素流动的要求比制造业更加高,因为制造业涉及人员流动相对较少,因而对资格认证、便利通关、医疗互通、教育互通的要求没有服务业发展那么高。随着粤港服务业合作深入发展,这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政策建议

1. 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成为合作旗舰

粤港服务业合作的重心在大湾区,大湾区的旗舰项目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要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成为比肩香港国际领先的高端服务业聚集区;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和地方法律法规创制权,突破粤港两地服务业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符合“一国两制”架构下企业合作机制的政策配套体系,打造体制机制软实力;培育自主可控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探索确保产业链安全发展的可行做法和经验;利用香港服务业发达地区的语言、技术等优势,建立香港接单,合作区交单的业务模式,共同开拓国际服务业外包市场,逐步形成国际服务业外包的完整产业链。

2. 加大力度鼓励大湾区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是服务业未来竞争力的源泉,是大湾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服务业未来主流发展方向。但是,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涉及到新技术的应用,新市场的培育,其失败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需要从政府政策层面从资金上加以扶持,政策配套要尽快跟上。在社会舆论氛围上,也要加以引导,创造允许竞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同时,对于成功的新业态、新模式,也要及时总结推广。

3. 加强监管合作,创新监管模式

随着粤港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服务业合作的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服务业监管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大,需要跟上新技术的发展,创新监管模式。监管部门要调整监管理念,优化监管程序和监管措施,运用实现新业态监管模式的持续创新。要丰富监管法律法规,加强两地监管法律法规的梳理对

接,对不符合合作要求的条文规章协商解决。在监管体制方面,也需要适度创新。适度分工,避免重复监管,加重企业负担。也要完善监管部门的常态化信息互通和业务交流,甚至可以考虑设置合署办公机制。重点突出,整体推进,深入探索跨境电商、跨境投融资、跨境医养保健等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新型监管模式。

4. 推进数字赋能服务业工程,加快粤港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是国际产业发展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粤港服务业合作,尤其是大湾区服务业的合作,要在数字赋能服务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要利用粤港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方面相对发达的有利条件,从政策协调、资金融通和资助、打通大湾区一体化市场、共拓国际营销渠道等几方面入手,抢占数字服务业发展先机,培育本土数字化服务企业做大做强;引导传统服务企业引入数字化技术进行转型升级,促进传统服务行业现代化发展;引导数字服务业与大湾区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使两者在融合中拓展各自发展空间,开发新技术,提升竞争力;在监管合作领域引进和示范数字服务技术。⑥

参考文献:

- [1] 陈恩,刘璟.广东服务业结构优化的战略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2):101-115.
- [2] 官照建.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J].财经界,2022(11):23-25.
- [3] 丁文璐,张铮.消费升级下服务业发展的趋势、挑战与转型路径[J].学习论坛,2020(05):32-40.
- [4] 洪群联,周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服务业发展的趋势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8(04):38-41.
- [5] 刘涛,刘馨.把握全球服务业开放新趋势[N].学习时报,2021-10(3).
-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219/c1001-30803984.html>
- [7] 魏作磊,詹迁羽.改革开放40年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分析与展望[J].广东服务业利用外资分析与展望[J].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10):21-26.
- [8] 陈秀英,刘胜.服务业空间转移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基于区域专业化视角[J].港澳研究,2018(04):75-85.
- [9] 周蕾,孙波.数字经济下广东服务业发展新趋势[J].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202(04):31-38.

作者简介:

左晓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粤港澳区域合作。

孟令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20级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

梁宇红,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粤港澳财金合作。

收稿日期:2022-10-10